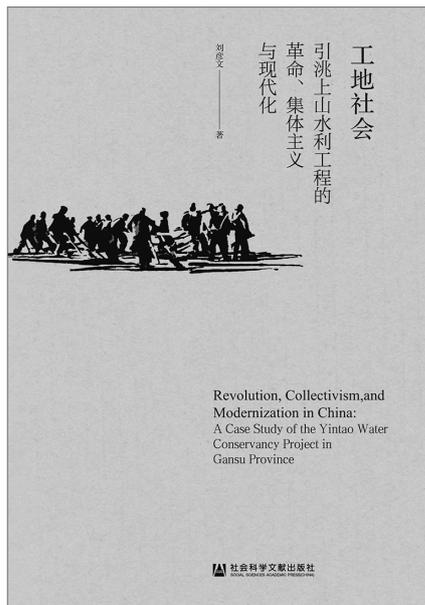


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試驗場

——評劉彥文《工地社會：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體主義與現代化》

● 阮清華



劉彥文：《工地社會：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體主義與現代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建設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是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理想目標。然而，其建設路徑卻無迹可循，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

鑒。即使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學習和模仿的對象，但自1956年以後雙方亦明顯分道揚鑣，中共開始獨立探索社會主義政權建設之路。現有研究成果如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關於上海市政警察改造的研究，高錚關於杭州的接管與改造，傅高義（Ezra F. Vogel）關於廣州的共和國初期史研究，張濟順、郭聖莉關於上海居民委員會的研究等，都對中共在城市建立新政權、掌控和管理城市社會進行了詳細探討^①。張樂天、辛逸關於人民公社的研究，黃樹民關於林村，陳佩華等人關於陳村的研究等，都對新中國成立後的農村政權建設有深入探討^②。

然而，不管是關於共和國城市政權建設，還是關於新政權向鄉村社會的滲透，研究者都發現，儘管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但中國社會原有的各種政治、文化和人際因素依然在新社會中發揮或隱或現的作用，對中共建設新社會的

不管是關於共和國城市政權建設，還是關於新政權向鄉村社會的滲透，研究者都發現，儘管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但中國社會原有的各種政治、文化和人際因素依然在新社會中發揮或隱或現的作用，對中共建設新社會的目標產生挑戰。

《工地社會》從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的角度，描述了在原本荒無人煙的崇山峻嶺中，中共和人民政府如何調動各種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歷史，同時也展示了在基本上沒有「舊社會」各種因素影響的情況下，新生的政權如何按照中共的理想藍圖進行新社會建設的故事。

目標產生挑戰。新社會是否完全符合共產黨的理想模式呢？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劉彥文的《工地社會：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體主義與現代化》（以下簡稱《工地社會》，引用只註頁碼）獨闢蹊徑，從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的角度，全面、立體地呈現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全新面貌，為我們考察中共新政權建設的理念和實踐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素材。

一項研究要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或者至少具備其中之一）：要麼佔有大量系統的、鮮為人知的新材料，要麼採用與傳統研究方法不同的新路徑^③。本書可謂二者兼而有之。書中充分發掘、利用了兩千餘卷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檔案，以及數量不菲的甘肅省委、省政府、省水利局、省民政局及相關地縣檔案館的原始資料，並輔之以大量各類公開文獻、內部資料、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史料，不僅詳細考察了1958至1962年甘肅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以下簡稱「引洮工程」）的來龍去脈，更着重分析在技術水平有限和物資匱乏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幾乎僅靠傳統的手工勞作，就地取材，建設大型公共工程。

《工地社會》描述了在原本荒無人煙的崇山峻嶺中，中共和人民政府如何調動各種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歷史，同時也展示了在基本上沒有「舊社會」各種因素影響的情況下，新生的政權如何按照中共的理想藍圖進行新社會建設的故事。按照作者的定義，「『工地社會』是在國家權力的強力推動下，由於某一大型工程的存在，而衍生

出來的一批人和制度的組合體。這個社會因毫無原有基礎而可被按照理想意志設置完備的組織體系，並有一套宣傳鼓動理念來支撐」（頁11）。也就是說，在大型建設工地，不僅國家組織機構在場，國家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等都在時刻發揮作用，共同構成一個既有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一般特點，又有自身獨特性的社會形態。

作者以「工地社會」為核心概念，按照時間順序將全書主體分為三個部分展開論述：第一部分「工地社會的誕生」，着重討論引洮工程的緣起、計劃和開工過程，呈現工地社會初創時期的雛形；第二部分「工地社會的運行」，詳細介紹了引洮工地的施工情況，不僅描述工地社會的日常勞作、生活、文娛以及政治運動等常規景象，也探討了工地上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各類人員的眾生相；第三部分「工地社會的裂解」，分析引洮工程的困局和高層決定工程下馬的經過，詳細探討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如何在工程停工、下馬過程中繼續彰顯黨和國家的存在，以及其在解決工地社會解體過程中的作為。三個部分按照時間排列，完整地再現了引洮工程建設的全過程。本書在中國當代史領域諸多方面都有重要推進，下文集中分析其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研究方面的拓展和創新之處。

一 國家政權組織的「另起爐灶」

關於中共新政權建設問題，現有研究不管是關注城市還是關注

農村，都特別強調對「舊社會」、「舊人」的改造。一般情形下，新政權的確只能通過改造「舊社會」來建設「新社會」，通過改造「舊人」來「形塑新人」^④，而不可能白手起家，全部按照理想模式從零開始打造。但在國家主導下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現場，卻為在「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頁11）提供了可能，使得新政權得以在工地上另起爐灶、建立一個全新社會。

在海拔兩千多米的崇山峻嶺之間，依靠人海戰術開挖一條人工運河，改變波濤洶湧的洮河走向，使之按照人類的意願，流向嚴重缺水的旱原地區，使「荒山變成花果山，千山變成米糧川」（頁21），這樣的設想對於「十年九旱」的甘肅人民來說，充滿無窮的誘惑和魅力。該設想自民國時期提出，卻限於戰禍頻仍等現實條件，始終無法付諸實施（頁26-33），在中共改天換地之後似乎有了實現的希望，正如一首題為《共產黨領導才實現》的民歌所讚頌：「人民早有引洮願，共產黨領導才實現。」（頁19）

1958年初，在大躍進「大幹快上」的狂潮中，甘肅省委決定正式上馬引洮工程。由於工程地跨二十餘個縣市，長達一千多公里，並且大多數工程位於地質條件複雜、地理環境惡劣的高山深溝之間，不僅需要甘肅舉全省之力以赴，而且需要國家其他單位的協同合作，因此組織工程施工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甘肅省為此設立專門機構予以管理（頁42-49、65-66）。

劉彥文按照歷史脈絡梳理了引洮工地上政府管理機構的組織框架和建立過程，詳細而全面地呈現了一個合乎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理想的全新國家政權組織形式。1958年3月，甘肅省委同意設立引洮水利工程辦公室，領導引洮工程的勘測、設計和籌備工作；甘肅省人民委員會又設立引洮水利工程局（後改稱「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以下簡稱「工程局」）和洮河水利工程委員會（後改稱「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委員會」），工程局和工程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由甘肅省委書記、省委農村工作部主要領導、副省長以及引洮工程數量最多的定西專區主要領導擔任（頁66）。隨後，定西開始抽調幹部進入工程局辦公，並陸續從省級各機關、蘭州市、天水專區抽調人員充實工程局。6月，甘肅省委常委會決定成立工程局黨委，直屬省委領導，負責領導整個引洮灌溉工程。黨委下設組織、宣傳兩部和秘書、資料兩室。工程局下設衛生、交通運輸、公安、人事等九處，並成立工程法院和檢察院，同時規定「工程局為專區級機關，直屬省人民委員會領導」（頁67-68）。工程局黨委和機關的配置跟其他專區類似，不同的是，工程局沒有單獨的轄區，而是高懸於引洮工程經過的所有地區。

在工程局下面，以承擔工程的縣為單位建立工區；「工區主任、黨委書記一肩挑，由縣委副書記或副縣長擔任」（頁71），但黨政兩套系統分開設立。工區黨委下設秘書室、組織部、宣傳部、監委，並兼

引洮工程不僅需要甘肅舉全省之力以赴，而且需要國家其他單位的協同合作，甘肅省為此設立專門機構予以管理。劉彥文梳理了引洮工地上政府管理機構的組織框架和建立過程，呈現了一個合乎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理想的全新國家政權組織形式。

從組織機構的角度來看，引洮工程工地就是一個縮小版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在集體主義至上的環境中，原有地方社會的「舊秩序」被抽空，重新組織到一個新的環境和氛圍中，個體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新秩序」下的螺絲釘。

管工區共青團委、幹部短期訓練班等，分別與工程局黨委對口部門對接。工區隸屬於工程局，一般設辦公室、工程技術科、物資供應科、財糧科、保衛科等科、室部門，各科、室分管業務與工程局各相應業務的處、室相對應，形成從上到下的垂直管理體制(頁71-73)。工區黨委和機關類似於一個縣級黨政機構，但只管轄所承擔引洮工程施工區域內的施工作業等，工地以外的社會由縣委、縣政府管轄。工區實際上是引洮工程的基層管理機構，但具有特殊性，既有屬地性質(主要領導由所在縣副職擔任，各科、室幹部由縣裏調配，施工隊伍由縣裏抽調和組建)，又不完全隸屬於當地縣委、縣政府，而是直屬於工程局黨委和機關領導。表面上，工區與縣委、縣政府可以平起平坐，但實際上，由於實行「民辦公助、就地取材」的方針，工區在人員、物資和生產生活等方面嚴重依賴縣裏(頁50-66)。

民工總隊在工區內成立，下設若干大隊，每大隊三千人，由公社負責；每大隊設立十個中隊，每個中隊三百人，由生產大隊負責；每個中隊分十個小隊，每隊三十人，由生產隊負責(頁71)。因此，施工隊伍實際上有兩套自上而下的管理機構，一是原有的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建制，在動員、組建以及後勤保障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二是工區的民工總隊、大隊、中隊、小隊的現場管理體制，實際負責日常勞動生產、娛樂生活、教育改造等方面。工程局和工區有關部門(人事、技術、工務、公安等)聯合

成立安全生產委員會負責施工中的安全問題。在施工隊伍中，同樣建立起各級黨組織，大隊設總支委員會，中隊設支部委員會，除總支委員會秘書外，所有書記、副書記和委員均不脫產(頁127)。另外，工區建有規模龐大的民兵組織，有的甚至一度建立了婦聯分會、工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頁140-44)。工區還有其他配套設施，包括衛生室、郵電所、商店、「簡易銀行」，以及為工程服務的炸藥廠、石灰廠、木製工具加工廠、灶具加工廠等(頁75-77)。

從組織機構的角度來看，引洮工程工地就是一個縮小版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省委、省人民委員會領導工程局黨委、機關，工程局黨委、機關領導工區黨委、機關，工區內再按照從公社到生產隊的建制管理各施工隊伍。在工地上，不僅有黨政機關，也有公安機關、法院和檢察院，還有共青團、民兵和其他群眾組織，以及為生產、生活服務的各類設施，由此構成的工地社會獨立於地方原有社會管理系統，成為一個突然「嵌入」的新社會。但這個新社會的人依然來自原來社會，在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引洮工地中(頁182-95)，以生產隊為單位、隊員彼此熟悉的小隊，被融入以生產大隊和公社為單位、隊員彼此陌生的中隊和大隊，個體實際上被淹沒到集體之中；在集體主義至上的環境中，原有地方社會的「舊秩序」被抽空，重新組織到一個新的環境和氛圍中，個體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新秩序」下的螺絲釘。在工地上，每一個民工既屬於工地

的施工小隊，又是原有生產隊的社員，這種雙重屬性使得國家對工地的管理變得輕鬆自如，既方便指揮，也容易在民工逃亡或失蹤後找回或者找到責任方（頁225-35、260-67）。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套全新的管理系統，使得共和國初期在技術落後和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依靠人海戰術，開展大型工程建設成為可能。

二 工地上的階級鬥爭與思想教育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階級鬥爭是「歷史的直接動力」，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槓桿」^⑤。中共不僅全盤接受了階級鬥爭理論，並在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依然認為階級鬥爭會長期存在。1958年5月，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確認，「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對於資產階級右派必須準備進行長時間的反覆的鬥爭，才能徹底解決他們同人民之間的矛盾」^⑥。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指導思想，對國民進行意識形態教育更是關係到其維繫與發展。然而，以施工建設為主的工地，如何成為意識形態教育的課堂，如何成為階級鬥爭的戰場呢？《工地社會》通過細緻的梳理，為讀者描繪了在熱火朝天的施工現場中，階級鬥爭如何上線的場景。

在整個引洮工程中，從工程局到施工現場的民工中隊甚至小隊，都建立起完善的黨組織系統，大部分黨員擔任了工地上的各種領導職務。工區黨組織與其他地方基層黨組織一樣，着重教育黨員「服從黨的組織，執行黨的決議」，並積極發現、培養積極份子入黨，給黨組織輸入新鮮血液；同樣定期召開黨代會，「宣傳鼓動以及清除『不良』思想」（頁129）。繳納黨費、參加組織生活是每一個黨員的基本義務，黨員需要定期上黨課，學習黨的章程、黨綱和各個時期各級黨組織的重要決議等。與整個國家政治形勢發展相適應，工區黨組織也開展整風、整黨運動，參加「大算賬」、「反右傾」、「三反」等運動，清理違法亂紀和不服從管理的黨員（頁128-36）。工地上的共青團和民兵等群眾組織也被納入教育、整頓之中（頁137-43）。

思想教育是中共凝聚人心、克服困難、提高幹勁的重要手段，也是清除雜音、「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要方法。施工現場忙碌而雜亂，民工勞動強度大，生活條件差，異常艱苦疲勞，但宣傳教育工作「見縫插針」地進行。工地上不僅有專門的宣傳部門和宣傳教育辦公室，還有由幹部和識字的積極份子組成的宣傳隊伍，隨時隨地開展宣傳教育（頁146）。思想教育應該和風細雨，但在引洮工地裏更多的是剛性的「大辯論」：「『大辯論』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鬥爭」，「白天勞動，晚上辯論，晴天勞動，雨天辯論」。民工可以用「大辯論」找出幹部的缺點、錯誤和違法亂紀行為；幹部

通過反覆宣傳的方式，國家不僅肯定引洮工程的可期未來和偉大意義，同時把對工程有懷疑、不滿，對工作有抗拒、排斥的人員清理出去，並加以嚴厲懲罰，進而試圖達到團結幹部和民工的目標。

對於各種「份子」自身而言，工地既是勞動改造的地方，也是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的課堂。各種「份子」從普通民工和幹部身上看到「改造好」以後的希望，幹部和民工則從他們身上看到淪為「份子」的悲慘。這種區隔和對比的存在，維繫着工地社會脆弱的平衡。

同樣也可以用它來管理不服從指揮的民工（頁155）。通過反覆宣傳的方式，國家不僅肯定引洮工程的可期未來和偉大意義，同時把對工程有懷疑、不滿，對工作有抗拒、排斥的人員清理出去，並加以嚴厲懲罰，進而試圖達到團結幹部和民工的目標。

國家在場的表現，不僅在思想意識形態的宣傳與教育方面，更在階級鬥爭和改造階級敵對份子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工地上，不僅匯集來自四面八方的根正苗紅的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積極份子，同樣也有許多右派份子、地主、富農、所謂「反動會道門」成員、前保長、「土匪」、「歷史特務」等各種形形色色的階級敵對或異己份子（頁64、267-68、280-82）。此外，工地本身也會生產「份子」，普通民工的各種違法違紀和不服從指揮、不聽話的行為，都有可能導致自身被打成各種「份子」。帶頭逃跑、散布不滿言論等，哪怕是貧下中農甚至是幹部，也一樣可以被重新認定為「反革命份子」、「壞份子」等（頁288-90）。各工區「以中隊為單位建立治保會，以小隊建立小組」，組建起一支強大的治保隊伍，武山工區約二萬人的民工中，有近五千人是治安員，由此可見各工區治保隊伍的龐大。他們對各類份子形成嚴密的監視網，「監督、改造『五類』份子，處理工地上一般的偷盜、打鬧等案件」（頁282）。

對於各種「份子」自身而言，工地既是勞動改造的地方，也是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的課堂。他們在工地

上幹最苦最累的活，還得經常接受各類調查、排隊和公開評審。他們區別於普通民工，更區別於幹部。這種區別對待使得階級鬥爭的弦始終繃緊，他們從普通民工和幹部身上看到「改造好」以後的希望，幹部和民工則從他們身上看到淪為「份子」的悲慘。這種區隔和對比的存在，維繫着工地社會脆弱的平衡，也時刻提醒普通民工「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個革命鬥爭的首要問題（頁289）。更為重要的是，因為這些「份子」的存在，工地上一切不合黨和政府意願的行為，都可以發配到「階級鬥爭」這個戰場上去。1958年9月，引洮工程正式開工才三個月的時間，工程局公安處即宣布「已發現的反革命案件和反革命嫌疑案11件」（頁295）。發牢騷的被視為「造謠生事」的反革命份子，因缺糧而偷盜糧食的被視為蓄意「破壞社會治安」的反革命份子；犯了錯誤的人，或者是各種被認為需要處理的人，工程局除了追溯其歷史身份、尋找其出身中與各種「份子」可以掛上鉤的蛛絲馬迹外，還可以直接命名為「新滋生的反革命份子」（頁294-97）。作者認為，「製造敵人」的手法與「階級出身論」一道維繫着工地社會的穩定（頁290）。

在一個大型公共工程建設工地，不僅是機器轟鳴的勞作現場，同時也是刀光劍影的戰場，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理論，在繁忙的建設工地同樣得到認真執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思想保障，階級鬥爭從不缺位。

三 工程下馬與善後中的國家

引洮工程作為「共產主義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創舉」，從一開始就是甘肅省的「一面紅旗」，得到受益區、甘肅省乃至全國各地的大力支援（頁158）。省委在工程開工之初就提出，要把「三分之一的力量投到洮河工程上面；各廳局必須把支援引洮工程提到自己議事日程的第一位」（頁68）。然而，整個工程建設，實行的卻是「民辦公助、就地取材」的方針，也就是說，中央政府並沒有下撥資金用於工程建設。甘肅省財政本來就捉襟見肘，事實上完全無力承擔工程建設費用，只能將工程任務分配給各受益區，由它們自行籌措建設資金、物資，並組織勞動力施工；再在省委、省政府的統籌下，調動其他地區力量予以支援。地方政府只能因陋就簡，在各項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試圖通過人海戰術，「改天換地」，戰勝自然。這個倉促上馬的工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是個悲劇，「兩三年能引洮上山，那是哄娃娃的話！」（頁56）

果然，工程開工以後，雖然有過一段熱火朝天的日子，但是很快就陷入困局，難以為繼。196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第六次書記處（擴大）會議（史稱「西蘭會議」），提出「貫徹中央指示，檢查糾正甘肅省委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犯的嚴重錯誤，制定並採取緊急措施，搶救人命，安排好全省人民生活」（頁328）。會後，工地開始精簡民工，工程逐步下馬，

各項善後工作同步開展。1962年3月，甘肅省委常委會議認識到，「當前對工程量太大和技術沒有過關的兩大問題確實無法解決……已經完成的工程，至今一無效益」，決定「引洮工程徹底下馬」（頁327）。原本計劃「苦戰三年，改變甘肅落後面貌」（頁42）的偉大計劃至此顆粒無收，且「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給全省人民帶來了很大的損失，給黨在群眾中造成了極不良的影響，教訓極為深刻」（頁327）。

不過，根據劉彥文的描述，工地社會裂解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繼續實驗和展示的過程。政治上，首先對那些在運動中受到打擊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其過程細緻而複雜，但在在顯示出黨和政府高度負責的形象。工程局成立「反右整風案件複查委員會」（後改為「案件甄別工作委員會」），由工程局黨委組織部部長領銜，工程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及各處處長參加。委員會對於受到批判的幹部材料全部複查，逐條仔細核對，形成複查意見，並與本人當面核對。大部分此前在工地上受到批判和錯誤處理的幹部得到平反，並獲重新安排工作和補發工資；但也並非所有幹部都獲平反，能落到實處的問題一定要維持原判或給予處罰。甄別平反顯示了黨和政府有錯必糾，維持原判則說明此前的處罰並非全錯，只是部分擴大化而已（頁338-44）。兩者的結合顯示出新政權在處理犯錯問題上既不遮掩，也不「一刀切」，顯得自信而穩重。作者認為，這種「實事求是和深入細緻進行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在一定程

工地社會裂解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繼續實驗和展示的過程。甄別平反顯示了黨和政府有錯必糾，維持原判則說明此前的處罰並非全錯。兩者的結合顯示出新政權在處理犯錯問題上既不遮掩，也不「一刀切」，展示出一個負責任的新政權形象。

工地社會既不同於普通建設施工工地，也不同於一般正常社會形態。它是一個在空白地帶建立起來的多重管理體系，這一概念可以用來很好地解析共和國初期大型公共工程建設，也可以用來更好地理解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理想形態。

度上減弱了政治運動帶來的消極影響」(頁344)，更展示出一個負責任的新政權形象。

與此同時，經濟退賠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引洮工程從全省各地無償平調了大量各種物資，給各地人民造成了經濟上的重大損失。工程下馬過程中，工程局「本着『破產』還債，堅決退賠的決心，拿出工程的全部家當，堅決、全部、徹底地進行退賠」(頁346)。通過算賬、清理、登記、退還或退賠物資，補發民工個人工資。對死者的撫恤、傷者的補貼工作亦相繼開展。退賠工作「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同時以國家利益為重」，雖然不可能做到各方滿意，但作者肯定「退賠過程仍舊顯示着黨和政府盡最大可能面對並挽回工程建設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這極大地鼓勵了國民經濟調整初期的幹群信心」(頁352)，在政治上也有利於挽回新政權的威望。

本書詳細論述了工地社會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節節後退，最終裂解化零的過程。但作者進而指出，工地社會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並未消極敗退，而是通過積極出擊，主動甄別平反冤假錯案、退賠平調物資、補發工資和撫恤死傷者，再次顯示出新政權的強大處置能力和自我糾錯機制的威力，從而在最大限度上消解了因耗時耗力而一無效益的工程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四 幾點商榷

引洮工地不僅僅是一個開山挖渠的施工現場，同時也是社會主義

國家政權建設的試驗場，數以萬計來自四面八方的農民、工人、技術人員、幹部以及各類「份子」匯集於此，按照中共的理想模式，創建一個全新的工地社會。工地社會既不同於普通建設施工工地，也不同於一般正常社會形態。它是一個在空白地帶建立起來的多重管理體系：所有幹部和民工都由原單位或所在縣、公社、生產大隊和小隊動員、輸送，被抽離出原有社會，組織進新的管理系統，但原有社會管理組織在遠處或暗處發揮作用；黨政系統在現場指揮勞動，組織參與各種政治運動和娛樂、學習活動；既有工地的繁重艱辛勞動，又有各類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和其他生產生活事務。因此，「工地社會」這一概念可以用來很好地解析共和國初期大型公共工程建設，也可以用來更好地理解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理想形態，是對現有相關研究路徑的開拓和創新，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劉彥文歷時十年，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鉤沉爬梳，圍繞「工地社會」這個核心概念，精心構建完成一本四十餘萬字的鴻篇巨著，實屬難能可貴。全書資料詳實，結構合理，觀點鮮明，不僅完整勾勒出引洮工程的來龍去脈，而且以此為基礎描述了一個全新的工地社會的方方面面，讀來獲益良多且深受啟發。當然，本書亦有一些值得完善和商榷的地方，茲特提出幾點進行探討：

第一，引洮工程領導機構的關係有待明晰。本書中出現了引洮水利工程辦公室、工程局、工程委員會等諸多機構。但工程局和工程委

員會與引洮水利工程辦公室、工程局和工區黨委等其他機構之間的關係並不清晰，這兩個機構之間的關係、各自的作用和分工也不清楚。另外，作者繪製的工程局組織機構圖似乎也有問題（頁69）。黨委會和工程局是兩個獨立的架構，但按照中共的制度設計，應該是黨委會領導工程局，然而該結構圖和相關論述沒有將其關係呈現出來。工地社會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新社會形態，其管理機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變化也在情理之中，將其關係梳理清晰，會更有助於理解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路徑和意義。

第二，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引洮工程到底存在何種關係？本書以2015年《人民日報》報導引洮工程一期供水成功為引子，作為該課題的研究緣起，應該說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在本書主體部分的最後，作者又在回到新世紀引洮工程的討論時指出，「這樣一個承載着甘肅幾代旱塬百姓希望的世紀工程，終於在國富民強之時走上前台」；「在『大躍進』時期，十幾萬民工與幾百萬後方百姓曾經為它所付出的艱辛努力，雖然遲滯了50多年，也終於逐漸看到了實效」（頁360）；導言亦有類似表述：「雖然中途停止，無果而終，但當年難以度量的付出並未付之東流。」（頁1）但本書的主要內容，幾乎都是在描述1958至1962年間的引洮工程經過幾年耗時耗力地修建仍一無效益、徹底下馬，即使已經建成的古城水庫也最終被迫炸毀（頁333）。半個世紀過去後，在條件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工程也無疑是採取完全不同

的方式進行修建，二者之間的聯繫何在？在那個國困民窮的時代，前後方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投入到一個荒謬的工程上去，數以千計的人長眠於崇山峻嶺之間，更不用說因工程耗費而導致的饑荒擴大，更多人或病或死。他們「用血肉之軀鑄就的生命歌哭」（頁1），能因為今天工程的成功而具有價值嗎？我們今天能夠心安理得地去為之唱讚歌嗎？若如此，作者似乎是將一個悲劇寫成了喜劇。更何況，正如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本書序言中所言，「如果將節點放到一百年後，考慮到大型灌溉項目對環境的長期影響，我們也不清楚屆時的研究者會如何評價它們」（頁III）。

第三，如何用一個失敗的工程去論述一種可能性？作者在導言中指出，現有相關研究「無法解釋大型水利工程在技術水平有限與物資匱乏的集體化時代何以屢屢成為可能」，似乎是要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典範，以此來說明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強有力的組織動員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作者卻用引洮工程興修為例，「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歷史學的解答」（頁5）。問題是，引洮工程最終失敗而徹底下馬，恰恰證明了不按經濟規律、不合乎人性辦事，最終必將頭破血流、一敗塗地。與第二個問題相聯繫的是，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成功去證明昨天的失敗是對的，或者是值得的。筆者理解作者是想用這個例子去探究在集體化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如何能夠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大型公共工程建設上

本書有一些值得完善和商榷的地方：第一，引洮工程領導機構的關係有待明晰。第二，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引洮工程到底存在何種關係？第三，如何用一個失敗的工程去論述一種可能性？

去，而不是要去解釋為何在技術水平有限和物資匱乏的時代還能成功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若如此，在表述上則需要重新斟酌。

五 小結

前幾年學界很興奮，認為中國當代史的研究方興未艾，「流水已到，渠成有待」，然而轉眼間已是物是人非，「澎湃的潮聲」未聞，卻已有曲終人散之勢^⑦。《工地社會》一書又給了學界欣喜和期盼。本書描述的雖是一個大型工地，但實際上用細描手法刻畫了一幅社會主義建設的全景圖，對於讀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實踐與過程，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當然，全書仍然有些問題值得繼續深入探討，如工地上民工如何相處、民工疏散後如何重新融入地方社會等，都可以作為新課題繼續展開研究。

本書描述的雖是一個大型工地，但實際上用細描手法刻畫了一幅社會主義建設的全景圖，對於讀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實踐與過程，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註釋

①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著，梁禾譯：《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高錚著，李國芳譯：《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嬗變(1949-195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傅高義(Ezra F. Vogel)著，高申鵬譯：《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郭聖莉：《城市社會重構與國家政權

建設：建國初期上海國家政權建設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② 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辛逸：《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黃樹民著，素蘭、納日碧力戈譯：《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北京：三聯書店，2002)；Anita Chan et al.,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③ 董國強、林小靜：〈社會主義饑荒的多維透視——評文浩《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10月號，頁157。

④ 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1-2。

⑤ 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節選)〉，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685。

⑥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八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6。

⑦ 王家範：〈對當代史研究的期望〉，載周武主編：《上海學》，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35-38。

阮清華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上海史研究中心研究員。